

符号与象征：《琵琶记》艺术表达手法的解读

邹晨彤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6年3月9日；录用日期：2026年4月8日；发布日期：2026年4月20日

摘要

《琵琶记》是中国古典戏剧作品的杰出代表之一，同时也是世界戏剧史上的杰作。该作品通过叙写赵五娘的贤惠孝顺，蔡伯喈的全忠全孝，展现了中国古代对于社会男女的道德要求与标准，以及当时的精神风貌。《琵琶记》的最突出艺术特征，在于对符号、象征的运用，极大丰富了作品寓意、思想内涵。本文以《琵琶记》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分析方法，探析其符号、象征的艺术表达。研究表明，作品中符号、象征的精妙运用，赋予文本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

关键词

《琵琶记》，符号，象征，艺术表达

Symbol and Symbolism: An Analysis of Artistic Techniques in “The Story of the Lute”

Chentong Zou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April 8, 2026; published: April 20, 2026

Abstract

“The Story of the Lute” is not only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classical Chinese drama but also a masterpiece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theatre. By depicting the virtuous and filial piety of Zhao Wuniang and the unwavering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of Cai Bojie, the work reflects the moral requirements and standards for men and women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outlook of that era. The most prominent artistic feature of “The Story of the Lute” lies in its use of symbols and symbolic imagery, which greatly enrich the implied meaning a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he work. Taking

the pla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textual analysis to explore its artistic expression of signs and symbolism.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exquisite application of symbols and symbolic devices in the work endows the text with deeper value and implication.

Keywords

“The Story of the Lute”, Symbol, Symbolism, Artistic Express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琵琶记》是中国古代戏剧的杰出作品之一，也是世界戏剧史上的杰作。该戏剧以赵五娘留家后的系列不幸，蔡伯喈离家后的富贵荣华，描绘了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展现了赵五娘的人生悲哀以及蔡伯喈的身不由己，体现了封建社会下人的尤其是女人的悲哀。《琵琶记》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无数学者的解读和研究，并且至今还在舞台上进行表演。

《琵琶记》最为突出的艺术特征，便是对符号与象征手法的大量运用。作品通过剧中符号的灵活转换、象征的精心建构，赋予文本深厚的思想内涵、多重寓意。符号与象征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是借助特定的物象、情节、现象，来暗示、隐喻、传达更为深层的意义。此种手法的运用，能够提升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能加深作品主旨，增强作品内容的思想深度。《琵琶记》中的符号与象征贯穿全剧，渗透于作品的各个层面。本文以《琵琶记》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对作品中的符号与象征进行阐释，剖析其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以为读者提供新颖的解读视角与审美路径。

2. 符号与象征在文学创作领域

象征手法起源于古希腊时期，最初仅用于标识身份信息，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逐渐演变为文学创作中至关重要的表现手法[1]。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文学与象征手法无缘，尽管中国古典文论并未明确提出现代美学范畴中的“象征”概念，但古人在漫长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早已自觉且广泛地运用这一手法，让象征手法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生俱来的艺术特质，也奠定了象征符号与文学表达深度融合的创作根基。

象征是贯穿古典文学批评与现代文艺理论的核心审美范畴，兼具广义与狭义双重内涵，是文学创作中传递深层情感、深化主题意旨的重要工具。学者李庆信在《〈红楼梦〉象征形态论》一文中，曾对象征的内涵进行专门阐释与系统辨析，他提出，象征是“作为符号动物的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远是人类蒙昧时期就已经存在。”[2]这一观点精准地点明了象征的本质，也印证了象征与文学创作密不可分的联系。周作人在1926年为刘半农诗集《扬鞭集》作序时，也针对象征手法发表了独到见解：“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让我说一句陈腐的话，象征是诗的最新写法，但也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3]周作人所言，直接揭示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象征手法的悠久渊源，指出《诗经》中的“兴”便是象征手法的雏形，且这一手法在《诗经》中已经得到系统化运用。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象征笔法，不仅丰富了文本的文学表达，更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数千年的文学创作，让象征符号成为中国文学塑造形象、传递主旨的常用手段。

步入 20 世纪初,中国学界主动引介、吸纳西方符号学与象征理论思潮,打破了传统文学象征手法的自发运用状态,让象征艺术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在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等一众学者、诗人的大力倡导与深度实践下,这套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实现了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学创作的融合,也推动了象征手法在现代文学中的成熟运用。与此同时,大批文人学者将理论付诸实践,用文学创作践行象征理论,鲁迅的《阿 Q 正传》便是其中的典范之作,充分展现了象征符号对人物塑造与主题升华的关键作用。作品通过塑造阿 Q 这一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人物形象,细致刻画其身边复杂的社会关系与人情百态,借由阿 Q 的个人遭遇,深刻揭露了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国民扭曲病态的精神心理与社会弊病。阿 Q 这一形象早已超脱了单个个体的范畴,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缩影,是整部作品最核心的象征。而在宏大的整体象征之下,作品还暗藏着诸多细微的象征符号,文中的环境布景、细节描写、人物对话等细碎意象,都承载着独特的象征意义,这些零散的小象征相互呼应、层层交织,共同构筑起完整的象征体系,进一步丰满人物形象、深化作品主旨,最终凝聚成一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完整象征,凸显了象征符号在人物塑造、叙事深化上的双重作用。

正如被誉为英国现代文学先驱的约瑟夫·康拉德所言:“所有伟大的文学创作都是含有象征意义的,唯其如此,它们才取得了复杂性、感染力与美感。”^[4]这句话精准道出了象征符号在文学创作中的核心价值,象征手法不仅能丰富文本的表达层次,更能提升作品的艺术深度与审美价值,这一点在中国古典戏曲中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琵琶记》作为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经典佳作,文本内部蕴含着鲜明的象征意蕴与独特的符号叙事特质,各类意象、情节、人物都暗藏象征深意。探析剧中的符号建构模式与象征艺术手法,理清象征符号对人物塑造、情节推进、主题升华的作用机制,既能深挖作品的艺术匠心与审美肌理,也能全面认知其艺术成就与文学价值,对解读古典戏曲的文学表达有着重要意义。

3. 符号与象征手法在《琵琶记》中人物塑造中的运用

(一) 人物姓名中符号与象征手法的作用

在《琵琶记》中,人物姓名设置并不随意,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鲜明的象征意义。戏剧中,每个人的名字,都如同一条线,将整个戏剧交织串联起来。以戏剧男主角蔡伯喈的姓名为例,“伯喈”二字来源于《诗经·大雅·卷阿》中“莘莘萋萋,雝雝喈喈”^[5]一句,此处的“雝雝喈喈”象征鸟类相鸣和谐的声音,象征着富有才华且性格高雅。

名字的寓意并非巧合,是作者的有意为之,有助于情节的推动。既为蔡伯喈几次不欲进京赶考了解释,也为其在科举中取得功名并获得牛丞相的欣赏做了铺垫。“蔡字,草也。”^[6]可以指代野草。蔡伯喈之名,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人物的命运隐喻。他虽才学出众,却性格软弱,无力掌控人生,如同浮萍与野草般身不由己,难以主宰自身命运。这一特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蔡伯喈出身平民,本无心功名,唯愿留居家中与妻子共奉双亲,却与父母意愿相违,在父母与乡邻的反复劝说下被迫离家赴考。其二,其考取功名后虽得牛丞相赏识,却无意与其女联姻,即便再三推辞,最终仍因皇帝赐婚而无力反抗,只得屈从。

(二) 人物形象中的符号与象征手法的应用

《琵琶记》中的蔡伯喈,是一个内在矛盾的复杂形象。他一方面渴望留居故里与新婚妻子琴瑟和鸣、亲侍双亲,追求安稳的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又难以违背父母光耀门楣的期许,潜藏着对仕途功名的被动认同,其内心始终在家庭温情与世俗期许间摇摆挣扎。

在《琵琶记》第四出中:

“浪暖桃香欲化鱼,期逼春闹,诏赴春闹。郡中空有辟贤书,心恋亲闹,难舍亲闹。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蔡邕本欲甘守清贫,力行孝道。谁知朝廷黄榜招贤,郡中把我名字保申上司去了;

一壁厢已有吏来辟名，自家力以亲老为辞。这吏人虽则去，只怕明日又来，我只得力辞便了。正是：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7], p. 19）

这段曲词凸显了蔡伯喈内心质朴本真的人生诉求。他本愿安守清贫、亲侍双亲，却因州郡将其姓名上报应试，加之父母殷切期盼，最终发出“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的慨叹。蔡伯喈对平凡孝亲生活的执着向往，与其性格上的软弱妥协形成鲜明张力，这一矛盾深刻地揭示了其内心的复杂、纠结、挣扎。

赵五娘这一形象也承载着深刻的符号内涵、象征意义。她既秉持传统礼教所规范的贤良淑德，又拥有着与同时代女性形象相比，较为罕见的独立意识、鲜明个性，突破了单一道德的局限。在第十一出中，“奴家自从儿夫去后，遭此饥荒；况兼公婆年老，朝不保夕。教奴家独自如何应奉？婆婆日夜埋怨着公公，当初不合教孩儿出去。公公又不伏气，只管和婆婆闲争。外人不理会得，只道是媳妇不会看承，以致公婆日夜闹吵。且待公婆出来，再三劝解则个。”（[7], p. 60）第十七出，“乡官可怜见，这些稻子呵，是我公婆命所关。若是必须将去，宁可脱下衣裳，就问乡官换。”（[7], p. 87）这些曲词进一步强化赵五娘的孝妇形象，使其成为封建礼教语境下的女性典范。然而从文学史在接受视角观之，此类道德化女性形象往往存在性格扁平、内涵单一的局限。但赵五娘并未落入这一窠臼，她虽以传统孝妇的身份示人，却仍具备独立的人格意识、鲜明的个性特征，形象更为丰富立体。在第二十一出中，“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没寻处。奴家恰便似糠呵，怎的把糠来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7], p. 105）这段曲词表明，赵五娘并非对丈夫的远走毫无怨怼，只是囿于礼教规范，情感难以放肆宣泄，仅能在独处时暗自抒发内心的悲苦、郁结。这一细腻的刻画，为日后毅然进京寻夫的果敢行为，提供了内在的性格逻辑、情感依据。

这两人的形象具备极强的象征意味。她们虽然存在于中国古代戏剧之中，其意义却远不止于戏剧作品本身，而是深深植根于漫长的中国封建礼教社会，象征着其中形形色色被压迫的男男女女。蔡伯喈与赵五娘所面临的困境，正是封建礼教社会中无数个体共同承受的命运。

4. 符号与象征手法在《琵琶记》主题表达中的运用

（一）忠孝主题的符号与象征意义

高明在《琵琶记》中，借助符号与象征手法巧妙诠释忠孝主题，既深化了主题内涵，也便于读者、观者更透彻地体悟戏剧主旨。一方面，幻境和物品等符号在《琵琶记》中得到充分运用，成为忠孝主题的有力支撑。赵五娘的孝义，常常通过这样一些幻境、物品予以寄托。如《琵琶记》第二十七出中，赵五娘以双手亲葬公婆，后与阴兵小神的对话，点明其孝行至诚、感天动地的精神内涵。第二十一出里，赵五娘历尽艰辛换回赈灾粮米，尽数奉养公婆，自身在厨下吞咽糟糠果腹，还因此蒙受婆婆误解。在此，糟糠已不只是普通食物，而是承载其孝行的关键物象，成为其至孝品格的具象见证。此类意象与情节符号的运用，既凸显了赵五娘人格的崇高，又强化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意蕴，使其形象兼具道德光辉与悲剧张力。

此外，《琵琶记》还大量运用象征手法，借助花草树木等自然意象，在彰显忠孝主题的同时，赋予作品一定的诗意与浪漫意蕴，并通过场景两极对照，进一步凸显赵五娘命运的悲剧性。如深院荷香满与松柏森森绕四围便是典型例证，蔡伯喈与牛小姐在庭院中赏荷纳凉、安享富贵，而赵五娘却在寒夜松柏环绕的荒冢间，孤身亲葬公婆。两组意象构成鲜明的境遇反差，既强化了赵五娘孝行的极致与崇高，也以强烈的对比深化了人物的悲剧色彩。此类象征手法的运用，有助于读者更深刻地体悟《琵琶记》的忠孝主旨、艺术内涵。

(二) 女性主题的符号与象征意义

《琵琶记》所蕴含的女性主题一直为人称颂。以“花”“琵琶”“画像”这三者在《琵琶记》中具备着重要的符号与象征意义，体现了封建社会之下，尤其是在礼教与贫困的双重重压下，女性如何以惊人的韧性与智慧，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尊严的。

《琵琶记》原文中多次出现的“琵琶”，是全剧最重要的象征符号之一。如第二十九出《乞丐寻夫》中，赵五娘道：“今二亲既已葬了，只得改换衣装，扮作道姑，将琵琶做行头，沿街弹几个行孝的曲儿，抄化将去。”([7], p. 142)此时的“琵琶”已不再是单纯的抒情工具，而沦为谋生的“行头”。这一用词将赵五娘的处境推向更深的悲剧层面：她不仅失去了家庭与身份，甚至连表达痛苦的方式也被迫商品化。琵琶不再仅是“行孝”的象征，更成为女性在绝境中仅存的谋生手段。通过艺术维持生存，既展现了赵五娘的才情与韧性，也暗示了在封建社会中，女性往往只能以“表演性”的方式争取生存空间。

此外，“画像”在《琵琶记》中虽着墨不多，却同样承载着极强的象征意涵。第三十六出中，牛小姐言道：“且住着，我相公昨日在弥陀寺中烧香，拾得一轴画像，不知什么故事，相公当时教我收下，我如今也将来挂在此间。”([7], p. 180)这段话出自牛小姐之口，发生在赵五娘进京寻夫、画像辗转落入牛府之后。牛小姐话语中的“画像”，浓缩了女性生存的多重困境：对赵五娘而言，画像是她“有真相而无身份”的挣扎；对牛小姐而言，则是她“有身份而无真相”的反讽。当牛小姐将画像“挂在此间”时，她无意中为真相的揭示搭建了舞台，也将自己卷入一场未曾选择的命运。

高明通过对“画像”这一符号的运用，展现了女性在封建秩序中的共同处境，无论是贫贱如赵五娘，还是富贵如牛小姐，女性都难以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体。

(三) 社会批评的主题符号与象征意义

在《琵琶记》里，作者高明巧妙使用符号、象征手法，揭示封建社会下小人物的无可奈何。封建社会官权的压迫、父权的束缚，成为高明揭示的重要符号。牛丞相虽为一朝之相，但是他的权利仍然受到他人的限制、威胁。这种权力角逐折射出封建官场内部对权力的极致追逐，更深刻揭露了封建官僚体系下的吏治腐败与制度弊病，是封建官场生态的真实写照。

同时，《琵琶记》深刻展现了父权与君权对个体的强力束缚。蔡公逼试、皇帝逼婚等情节，直观呈现出封建伦理秩序下父权与君权对个体意志的双重压迫。作品通过此类主题符号的运用，揭示了传统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性。与诸多古典戏曲不同的是，《琵琶记》并未张扬反抗精神与叛逆意识，而是着力书写个体对不合理的父权、君权的妥协、顺从，这恰恰构成了作品最为深层的悲剧内核。蔡伯喈本不愿赴考，却屈从于父命被迫应试；入仕之后，又迫于皇权威压而迎娶牛小姐。赵五娘亦在封建礼教的规训与束缚之下，一步步走向坎坷多难的人生境遇。

正是个体对这种不合理的封建秩序盲目信服、屈从，才最终酿成一系列无可挽回的人生悲剧。人物彻底丧失反抗意志、叛逆精神，全然沦为伦理秩序的牺牲品，正是其悲剧性的核心所在。

5. 结语

《琵琶记》中符号与象征手法的丰富运用、巧妙布设、深刻表意，赋予了作品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品鉴价值。立足文学批评的视角与方法，对剧中的符号及象征意象进行解读，能够更精准地体悟这部经典剧作的艺术魅力，更深层次地挖掘其内在的价值底蕴。《琵琶记》作为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经典不朽之作，其符号与象征艺术的运用与表达，更是传承至今的宝贵文化财富。作品中各类符号、象征意象的巧妙布设，不仅极大提升了戏曲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更为后世读者与研究者解读作品提供了全新的审美视角与独特的文化体悟。

参考文献

- [1] 李国辉. 体用同源、显微无间——西方文化和文学中象征的中国诠释[J]. 文学评论, 2023(3): 125-133.
- [2] 李庆信. 《红楼梦》象征形态论[J]. 红楼梦学刊, 1997(4): 80-91.
- [3] 钟叔河, 编. 周作人散文全集《扬鞭集·序》[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636.
- [4] 侯维瑞. 现代英国小说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135.
- [5] 王秀梅, 译注. 诗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95.
- [6]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整理. 康熙字典标记整理本[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1024.
- [7] 高明. 琵琶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